

# 振而不“兴” 西部高校需要哪些“强干预”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实现缩小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差距的干预对策是‘强干预’，反之则为‘弱干预’。”作为一种干预方法，弱干预和强干预率先在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近日，在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和《重庆高教研究》联合主办的西部高教论坛上，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刘徐湘将其引入西部高等教育的论述中。

围绕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石河子大学、重庆文理学院等高校的11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展开了讨论。

那么，究竟政府应在哪些方面实行“强干预”，哪些方面实行“弱干预”？西部高教的办学出路又在何方？

## 分类发展 理念先行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存在两起东西部高等教育差距明显缩小的事件：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东部高校向西部的迁移；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三次重要的布局调整——1953年完成的院系调整，1955至1957年完成的沿海城市大学向内陆迁移，以及1964至1971年的三线建设的高校向内地迁移。

刘徐湘将这些事件定义为“强干预”，而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干预对策视为“弱干预”。“当前，不能只是对西部进行照顾性的政策支持，而需要以强力的政府行为，干预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布局，从‘弱干预’变为‘强干预’。”

有哪些西部高教亟待的“强干预”呢？以分类办学为例。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魏丽娜介绍，同为大国贫困地区，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于本世纪初形成了清晰的分类体系。以加拿大阿尔伯特省为例，1995年后，该省形成了6个亚系统，分别是大学、公立学院、私立学院、技术职业学院、职业学院及其他办学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引导鼓励多层次、各类型高校特色化发展建设，关注公平与包容相关议题，促进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沿着特色化、内涵化道路发展。

反观我国，当前西部高教尚存在盲目跟从研究型大学发展、盲目跟从东部高校发展，忽视东西部高校品质差异的现状。“要在短期内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是一种奢望，盲目地追赶东部高校完全没有意义。”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川说。

在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洪成文把西部高校大致分为四类。他表示，应鼓励位于西部的“双一流”高校（大于20所）、红色基因高校（20余所）、国家特别帮扶高校（大于21所）、其他类型的高校（小于20所）先发展起来，以此带动其他西部高校的发展。

在西部高校的振兴问题上，洪成文指出，目前国家实行“双一流”建设，各省区市实施地方“双一流”建设，仅是这样的单杠杆撬动远远不够。

“西部高校的发展缺少为全体西部高校着想的大规划。”他表示，20年前，国家因财政紧张，只安排了79所教育部部属院校。时至今日，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如果增加21所部属高校，且这21所高校全部位于西部，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格局。

洪成文进一步指出，可以将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如延安大学、湘潭大学、遵义医科大学、遵义师范学院、百色学院、井冈山大学、吉首大学等）作特殊考虑，如提高其生均拨款等。“因为高教发展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这些高校，而地方财政尚不能优先考虑这些高校。”

在刘徐湘看来，国家的一些政策在东西部不应该“一刀切”，比如不能禁止所有高校异地办学，而应鼓励东部名校到西部高校办分校，这样才能为西部高等教育带来活力。与之相配套的是，西部地区应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西部高校则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

## “没自信”需要干预

当前，一些发展西部高教的举措看似“强干预”政策，但在具体操作中仍需要“强弱干预”结合。在论坛上，专家呼吁，当下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可落地的政策与更切实的帮扶。

应用型高校是西部高教的生力军之一。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在论坛上展示了一组数据：我国西部应用型本科高校（211所）占西部普通高校（734所）的比重是28.75%，占比将近1/3；占西部本科高校（309所）的比重是68.29%，占比超过2/3。

他指出，要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如果西部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振”，必将使“振兴”成为空谈。

2020年，新华社授权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在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然而，一些西部省份的管理者对发展包括应用型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存在错位认识。他们认为，理想的应用型大学需要背靠产业，但西部地区产业薄弱，因此应用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留在本地工作，最后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西部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手脚”。“这说明西部高校应用型、地方性、开放式的核心理念尚未牢固确立。”顾永安说，事实上，目前一些西部应用型高校满足当地产业的人才供给的比重尚不足1/3，企业招不到想要的人才，根源在于高校无法培养出企业所需之才，这说明西部应用型高校尚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

在顾永安看来，西部应用型高校发展存在的种种难题中，与结构和能力相比更为严重且隐性的问题，存在于干部队伍的思想理念、精神状态与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等层面。“等靠要、叹衰调、畏难不前、执行不力、效率低、效能低、少学习研究、少主动作为；官本位、行政色彩浓；创新创业氛围不浓。”

涉及具体操作，顾永安表示，西部应用型高校的发展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有愿景目标、办学定位、办学理念、文化战略眼光，由此构成的顶层设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其次，要聚焦内涵式发展。很多西部应用型高校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落实、定位以及构建体系。这其中需要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发展战略。此外，还要把握高校的阶段特征。

曾有学者指出，西部高等教育实现突破的关键点在于，西部高校要有二次创业精神，寻求体制机制的全面变革。对于西部高教在竞争、超越以及创新时所暴露出的缺少自信等问题，也需要通过“强干预”来建立政策上的自信。

## “挖人”“找钱”尚缺有力保障

西部高教的办学之路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双重困境，从近年的情况看，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钱”与“人”。

事实上，这两大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大学

的重点。在论坛上，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以金陵大学的制度规约为例，指出民国期间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主要依靠钱、钱、人。反观如今东部高校之间的“挖人”现象，他依然强调“制度规约”的重要性。“违规抢跑、超越红线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更易造成不规范竞争。倘若付出代价高，就没有一所高校敢以身试法。”

这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强干预”。虽然目前有东西部高校帮扶、西部学科发展支持计划、西部研究生教育支持计划、教师进修计划、西部大学千名校长海外培训计划等一系列扶持动作，但其金额相比“双一流”建设经费，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洪成文看来，应该鼓励西部高校自行筹资。然而，现行政策既不鼓励“钱生钱”，也不鼓励高校自己去找钱。同时，除了“双一流”高校之外，也很少用国家的财政补贴地方高校。

他建议，西部高教发展应设立西部高校筹资匹配资金，以鼓励西部大学自我筹资，即高校筹集多少资金，当地政府进行相应或等额的匹配。此外，还可以把西部高校1/3的讲席拿出，获得冠名捐款，为西部高校设置讲座教授，以此赢得社会和企业的支持；发动海内外校友反馈母校，以扩大资金渠道。

对于政府而言，他强调，国家级大学要扩容。此外，应给予红色基因高校适当补贴；将教育部的教育基金会更名为西部教育基金会；同时，把西部高教发展的政策效应倍增化，总结对口扶持工作经验，将中国特色提炼总结，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还是通知书，最初的风格都奠定了现在的基础。所以说，前人用心，后人乘凉；前人不用心，后人要“背锅”。

当下，高等教育正处于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时代，高校需要积极宣传自我，增加自身的吸引力。从不用心、没品位的通知书到“高大上”的通知书就要打破路径依赖，这需要对通知书的重要性有充分共识，需要高校以其格局与审美作为根基，需要关键人物做出努力，更需要发挥大学全员的智慧。

行文至此，笔者有三点感受。其一，对于通知书的设计，笔者本以为是件非常稀松平常之事，没想到它那么重要，学生会那样在意；其二，笔者本以为设计一份“高大上”的通知书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却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困难；其三，本文说的是通知书不够“高大上”的成因，但似乎当前高校很多问题背后都有这些逻辑，比如，笔者就曾针对高校毕业典礼发表过类似观点（详见《中国科学报》6月29日《大学毕业典礼够“格”的三条标准》一文）。

换言之，无论是通知书还是毕业典礼，要想做到“高大上”，都需要克服以上问题。据学生说，他们会向其报考的学校反映，期待通知书不够“高大上”的问题能够有所改善。笔者也相信，当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高校生态也将得到整体性和基础性的改善。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青年课题“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IA200268）阶段性成果）

## 高教观澜

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不同于学术型博士的专业博士越来越得到公众认可。特别是2020年9月22日，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见》以来，大力发展以专业博士为代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此类博士在我国的发展历时尚不及前者，因此在招生范围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便是教育博士。

作为目前我国专业学位中已经开设的一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教育博士最早发源于美国，随后被各国借鉴与发展。截至目前，教育博士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教育博士现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博士专业学位。

在我国，教育博士也已经有10多年的开设历史。2008年底，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和试办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并于2010年在清华大学等全国15所大学正式开始招生。

目前，我国教育博士的招生对象大部分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与管理干部，这是由于教育博士在招生时，都遵循了国家有关部门所规定的“暂不招收教育行政机关、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原则。另外，该学位在教育领导与管理领域的招生人数最多，比例约为70%左右。

在2008年底，《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正式发布之前，教育部官方网站上曾有一个关于教育博士设置的群众来信询问。教育部的答复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专业学位总体设计研究工作，拟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总体设计我国专业学位发展规划，并启动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专家论证工作。

由此可见，我国教育博士的设置与发展在根本上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且过程中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然而，招生对象“暂不招收教育行政机关、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否符合国际上的经验呢？

对此，笔者专门对美国的博士招生对象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调研，主要发现如下——

其一，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教育博士在2013年秋季招收了最后一批学生，目前仅有教育哲学博士（Ph.D）和教育领导博士（Ed.L.D.）两种项目。该校的教育博士项目比较复杂，国内对其学术探讨较多，笔者在此不做赘述。本文仅想强调，目前哈佛大学的教育领导博士（Ed.L.D.）项目的招生对象并未限制在“各级各类学校”的人员，而是涵盖了“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教育工作者”。

其二，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目前也有教育博士项目，其招生对象也并未对企业人员与政府工作人员进行限制，录取与否主要是看申请对象是否专业对口，以及是否有相关的研究能力和意愿。目前其教育博士项目的在读学生中，既有中小学教师，也有一些教育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人员，还有教育行政官员。

其三，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多个教育博士项目，每个教育博士项目都没有明确表示其招生对象要排除某个群体或者限定在特定群体内，其官方网站上罗列的校友现有职业中，包括但不限于教育行政官员、教育非政府组织、教育企业的人员。

其四，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博士项目也没有明确说不招收特定背景的人员，该校相关网站展示的毕业生既有来自大学的，也有来自中小学，乃至于政府部门和教育公司的。

其五，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这是笔者查到的有明确限定招生对象的唯一一所美国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目前有三个教育博士项目。其中，教育领导力/教育管理项目要求申请人有北卡州小学校长执照；社区大学领导力项目希望招收社区大学的老师；但教育科技的项目对于申请人职业没有任何限制。

综上所述，在美国，越是高水平的大学，对于教育博士项目的招生对象越没有限制，可见目前我国教育博士的招生对象“暂不招收教育行政机关、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不符合美国的经验。

那么，我国教育博士的招生对象是否反映了社会需求呢？笔者也针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相关企业及机构做了一个简单的关于就读教育博士的意愿情况调研，被调查机构的人员中，就读教育博士的意愿相当强烈。

事实上，为了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的“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国家战略目标，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非政府组织、教育企业在内的所有教育组织与机构的人员，都很有必要进行教育博士的学习。

总之，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需求，都表明我国教育博士可以适当扩大招生对象范围，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育企业人员开放。如果说贸然全面放开存在一定的风险，则可以先在一些高水平大学试点。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 教育博士招生对象须「扩容」

■李锋亮

# 为何有些录取通知书不够“高大上”

■张晓报

近期，随着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推进，考生们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在收到通知书后，有些同学却向笔者表达了一种失望之情——录取通知书看起来太“差劲”了。失望的同时，他们内心更是不解：同样是录取通知书，为什么别人的大学能将通知书设计得那么“高大上”，这其中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作为曾经的大学生和今天的大学老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思想与观念上的轻视。通知书只是

薄纸一张，供通知录取和新生报到使用，只要信息无误，就能发挥其实际作用，似乎好不好看、是否“高大上”并没有那么重要。这就导致一些高校并没有把通知书的精致与否当回事。

但实际上，通知书事关学校形象。好的通知书能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甚至令人产生高度的学校认同。一些学生可能还会因为某个高校的通知书而对其产生向往。反之，一张普普通通，甚至还有点“差劲”的通知书，则可能直接导致学生对学校的轻视和否定。

换言之，学生对高校很多美好的想象，既可能被一张简单应付了事的“纸张”打击，也可能被一张或精致、或厚重、或特别的“作品”增强。

其次是高校格局与审美的投射。一所高校的精致是具有整体性的，如果高校精致，必然在多方面表现出精致，特别是当精致已经成为一种整体文化与精神时，就会在高校的方方面面得到体现。反之，一所不精致的高校，其审美、品味、格局等早已固化，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精致都会是一种奢侈。

因此可以说，一所高校的格局与审美会投射到学校的方方面面，包括通知书。当然，这种整体性不能简单地与高校水平直接挂钩。虽然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很多名校的通知书获得了普遍好评，但亦有一些“双一流”高校的通知书制作得很一般。

第三是决策与执行主体的错位。任何一所高校都会有审美素养较高，且希望能把通知书做得更加精致的人。然而遗憾的是，有想法的人往往并不具有决策权，反之，有决策权的人可能又没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决策与执行主体的

错位还带来了责任分散的问题，即通知书看似与高校多个部门有关，然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承担责任，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问题——设计者和决策者都觉得通知书做得不好的责任在于对方。

第四是求稳与标新立异的冲突。通知书早已自有之，如果之前的版本制作一般，想进行重新设计就要挑战过去，这就意味着很可能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甚至还会遭到他人非议。不仅如此，设计一个新的通知书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可谓吃力不讨好。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过去传统方式做当然是最为保险之举。于是，安于通知书的现状而不愿意改变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

第五是额外付出与不可承受之重。设计新通知书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时间与精力成本等。这其中，经济成本对于高校而言一般都能承受，但当前在很多高校，无论是教学科研人员还是行政人员，几乎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有精力再去做这种“锦上添花”的事。此时，利用往年的模板打印好相关信息（如收信地址）的方式当然最为省时、省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生抱怨高校和相关人员“什么都按部就班，不愿意付出精力”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变革创新与路径依赖的制约。路径依赖理论揭示，初始的体制选择会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会强化现存体制，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变革。也就是说，不管制度是否合理，但因其具有强大的惯性，往往会一直持续，所以最初的设计很关键。在此情况下，最初设计的质量就尤为重要。事实上，无论是高校的建筑

